

【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】

资治通鉴

二

〔宋〕司马光

编撰

沈志华

张宏儒

主编



中華書局



湖大图书馆 ZS063208

【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】

资治通鉴

二

汉纪

[宋] 司马光 编撰
沈志华 张宏儒 主编



中华书局

目录

- 卷第十七 汉纪九起辛丑(前140)尽丁未(前134)凡七年 …… 626
- 卷第十八 汉纪十起戊申(前133)尽丙辰(前125)凡九年 …… 666
- 卷第十九 汉纪十一起丁巳(前124)尽壬戌(前119)凡六年 …… 712
- 卷第二十 汉纪十二起癸亥(前118)尽辛未(前110)凡九年 …… 754
- 卷第二十一 汉纪十三起壬申(前109)尽壬午(前99)凡十一年 …… 792
- 卷第二十二 汉纪十四起癸未(前98)尽甲午(前87)凡十二年 …… 836
- 卷第二十三 汉纪十五起乙未(前86)尽丙午(前75)凡十二年 …… 874
- 卷第二十四 汉纪十六起丁未(前74)尽癸丑(前68)凡七年 …… 906
- 卷第二十五 汉纪十七起甲寅(前67)尽己未(前62)凡六年 …… 950
- 卷第二十六 汉纪十八起庚申(前61)尽壬戌(前59)凡三年 …… 994
- 卷第二十七 汉纪十九起癸亥(前58)尽壬申(前49)凡十年 …… 1026
- 卷第二十八 汉纪二十起癸酉(前48)尽己卯(前42)凡七年 …… 1058
- 卷第二十九 汉纪二十一一起庚辰(前41)尽戊子(前33)凡九年 …… 1096
- 卷第三十 汉纪二十二起己丑(前32)尽戊戌(前23)凡十年 …… 1140
- 卷第三十一 汉纪二十三起己亥(前22)尽丁未(前14)凡九年 …… 1184
- 卷第三十二 汉纪二十四起戊申(前13)尽癸丑(前8)凡六年 …… 1226
- 卷第三十三 汉纪二十五起甲寅(前7)尽乙卯(前6)凡二年 …… 1256
- 卷第三十四 汉纪二十六起丙辰(前5)尽戊午(前3)凡三年 …… 1290
- 卷第三十五 汉纪二十七起己未(前2)尽壬戌(2)凡四年 …… 1324
- 卷第三十六 汉纪二十八起癸亥(3)尽戊辰(8)凡六年 …… 1364

卷第十七 汉纪九

起辛丑(前140)尽丁未(前134)凡七年

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

建元元年(辛丑,前140)

1 冬,十月,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,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,对者百余人。广川董仲舒对曰:“道者,所繇适于治之路也,仁、义、礼、乐,皆其具也。故圣王已没,而子孙长久,安宁数百岁,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。夫人君莫不欲安存,而政乱国危者甚众;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,是以政日以仆灭也。夫周道衰于幽、厉,非道亡也,幽、厉不繇也。至于宣王,思昔先王之德,兴滞补敝,明文、武之功业,周道粲然复兴,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。”

“孔子曰:‘人能弘道,非道弘人。’故治乱废兴在于己,非天降命,不可得反;其所操持悖谬,失其统也。为人君者,正心以正朝廷,正朝廷以正百官,正百官以正万民,正万民以正四方。四方正,远近莫敢不壹于正,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,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,群生和而万民殖,诸福之物,可致之祥,莫不毕至,而王道终矣!”

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

建元元年(辛丑,公元前140年)

1 冬季,十月,汉武帝下诏,令大臣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人才,武帝亲自出题,围绕着古往今来治理天下的“道”,进行考试。参加考试的有一百多人。广川人董仲舒在答卷中说:“所谓的‘道’,是指由此而达到天下大治的道路,仁、义、礼、乐都是推行‘道’的具体方法。所以,古代圣明的君王去世之后,他的后代可以长期稳坐天下,国家几百年太平无事,这都是推行礼乐教化的结果。凡是君主,没有人不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安宁长存,但是却有许多国家遭受政治昏乱、国家危亡的厄运。其原因就在于君主用人不当,没有按照正确的方法来治理国家,所以国家政治一天比一天接近灭亡。周王朝在幽王、厉王时期出现衰败,并不是由于治国的道路不存在了,而是由于幽王、厉王不遵循治国之道。到了周宣王在位时,他仰慕过去先王的德政,恢复被淡忘的先王善政,改革近世的积弊,发扬周文王、周武王的功业,周代的王道再次焕发出夺目的光彩,这是日夜不懈地推行善政而取得的成效。

“孔子说:‘人可以发扬光大道,而不是道提携人。’所以,国家的治乱兴亡在于君主自己,只要不是天意要改朝换代,统治权就不会丧失;君主的作为悖理错误,就会丧失统治地位。做君主的人,首先端正自己的思想,然后才能用以整肃朝廷,整肃了朝廷才能用以整肃百官,整肃了百官才能用以整肃天下百姓,整肃了天下百姓才能用以整肃四方的夷狄各族。四方的夷狄各族都已整肃完毕,远近没有胆敢不统一于正道的,没有邪气冲犯天地之间,因此就会阴阳谐和,风调雨顺,生物安和相处,百姓繁衍生息,所有象征幸福的鸟兽和可以招致的祥瑞征兆,全都出现,这就是王道的最佳境界了!

“孔子曰：‘凤鸟不至，河不出图，吾已矣夫！’自悲可致此物，而身卑贱不得致也。今陛下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居得致之位，操可致之势，又有能致之资，行高而恩厚，知明而意美，爱民而好士，可谓谊主矣。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，何也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。夫万民之从利也，如水之走下，不以教化堤防之，不能止也。古之王者明于此，故南面而治天下，莫不以教化为大务。立太学以教于国，设庠序以化于邑，渐民以仁，摩民以谊，节民以礼，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，教化行而习俗美也。圣王之继乱世也，扫除其迹而悉去之。复修教化而崇起之；教化已明，习俗已成，子孙循之，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。秦灭先圣之道，为苟且之治，故立十四年而亡，其遗毒馀烈至今未灭，使习俗薄恶，人民鬯顽，抵冒殊扞，熟烂如此之甚者也。窃譬之：琴瑟不调，甚者必解而更张之，乃可鼓也；为政而不行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，乃可理也。故汉得天下以来，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，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。

“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，少则习之学，长则材诸位，爵禄以养其德，刑罚以威其恶，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。武王行大谊，平残贼，周公作礼乐以文之；至于成、康之隆，囹圄空虚四十馀年；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，非独伤肌肤之效也。

“孔子说：‘凤凰不来，黄河也不出现龙马背负的河图，我还是算了！’他为自己的德行本可招致这些祥瑞，但因为身份卑贱不能招致，而感到悲哀。现在，陛下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身居得以招致祥瑞的尊位，手持可以招致祥瑞的权势，又有能够招致祥瑞的资质；品行高尚而恩德深厚，头脑聪明而心地善良，爱护百姓而尊重贤士，可称得上是好君主了。但是，天地没有相应的表示，祥瑞没有出现，原因何在？主要在于没有推行道德教化，百姓没有走上正路。百姓追逐财利，就如同水急速地流向低处一样，不用教化筑成河堤来约束它，就不能阻止。古代英明的君主深知此理，所以在身为君主治理天下时，没有不把教化作为根本大事的。建立太学，以便在都城兴起教化，兴办学府，以便在地方城邑中开导民众，用仁来引导民众，用义来激励民众，用礼来节制民众，所以，当时的刑罚很轻而没有人触犯法禁，其原因在于推行了教化而社会风俗很好。圣明的君主接收了一个昏乱的世道，首先要把它的一切残馀全部扫除，再兴办教化，提高教化的地位；教化已见明效，好的社会风俗已经形成，子孙后代沿袭不变，实行五六百年也不会衰败。秦朝不采用先代圣王的治国之道，实行不顾长远、只顾眼前的统治方法，所以立国仅有十四年就灭亡了。秦遗留下来的恶劣影响至今还没有清除，导致社会风俗浅薄恶劣，百姓不讲忠信德义，触犯法律，殊死反抗，风俗竟然败坏到如此程度。我私下做了这样一个比喻：弹奏琴瑟音律不和谐，严重时必须解下旧弦，更换新弦，才可以弹奏；实施统治遇到了阻碍，严重时一定要加以改变，才能治理好国家。所以，自从汉朝得到天下以来，一直想治理好国家，但至今没有治理好，其原因就在于应当实行改革的时候而没有实行。

“我听说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，让他的臣民年幼时学习知识，成年后就给他官位以磨砺他的才能，颁给爵位俸禄以培养他对君主的感恩戴德，实施刑罚以威慑他的罪恶念头，所以，百姓才能通晓礼义，而以冲犯君主为耻。周武王奉行天下大义，推翻了独夫民贼，周公制作了礼和乐来修饰周政；到了成王、康王的大治时期，没有人犯罪，监狱空无一人长达四十多年。这也是推行教化和仁义的结果，而不止是用伤残皮肉的刑罚去威胁百姓的成效。

至秦则不然，师申、商之法，行韩非之说，憎帝王之道，以贪狼为俗，诛名而不察实，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。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，外有事君之礼，内有背上之心，造伪饰诈，趋利无耻；是以刑者甚众，死者相望，而奸不息，俗化使然也。今陛下并有天下，莫不率服，而功不加于百姓者，殆王心未加焉。《曾子》曰：‘尊其所闻，则高明矣；行其所知，则光大矣。高明光大，不在于他，在乎加之意而已。’愿陛下因用所闻，设诚于内而致行之，则三王何异哉！

“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，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。故养士之大者，莫大乎太学；太学者，贤士之所关也，教化之本原也。今以一郡、一国之众对，亡应书者，是王道往往而绝也。臣愿陛下兴太学，置明师，以养天下之士，数考问以尽其材，则英俊宜可得矣。今之郡守、县令，民之师帅，所使承流而宣化也；故师帅不贤，则主德不宣，恩泽不流。今吏既亡教训于下，或不承用主上之法，暴虐百姓，与奸为市，贫穷孤弱，冤苦失职，甚不称陛下之意；是以阴阳错缪，氛气充塞，群生寡遂，黎民未济，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！

“夫长吏多出于郎中、中郎、吏二千石子弟，选郎吏又以富訾，未必贤也。且古所谓功者，以任官称职为差，非谓积日累久也；故小材虽累日，不离于小官，贤材虽未久，不害为辅佐，是以有司竭力尽知，务治其业而以赴功。今则不然。累日以取贵，积久以致官，

到秦代就不是这样了。秦沿袭申不害、商鞅的法令，实行韩非的学说，憎恶上古帝王的治世之道，提倡贪求财利的风俗，只看虚名而不注重实际，做好事的人不一定能幸免受刑罚，而做坏事的人也不一定受到惩罚。因此，百官都追求虚名假誉而不注重实际政务，表面上有侍奉君主的礼仪，内心却有背叛君主的念头，弄虚作假，追逐财利，毫无廉耻；所以遭受刑罚的人很多，死人连成片，但是犯罪却没被制止，是风俗的影响造成了这样的状况。现在陛下统治全国，天下没有不服从的，但是却没有给百姓带来功德，大概是由于您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吧。《曾子》一书说：‘尊重所听到的道理，他就算是高明了；实践所知道的知识，他就算是光大了。高明光大，不在于别的，就在于认真注意罢了。’希望陛下能依据所听到的道理，真诚地信奉它并把它推行开来，那么，您与圣明的三王就没有什么不同了！

“平常不招徕和尊重士人，而想求得贤能之臣，就好像不雕琢玉石而想得到花纹美丽的玉器一样。所以，招徕和尊重士人的方法，没有比兴建太学更为重要的了；太学，是培养贤士的处所，是推行教化的根本。现在，让一郡、一国的所有民众都来参加皇帝主持的考试，而没有一个符合诏书要求的人才，这说明上古圣王之道几乎灭绝了。臣希望陛下兴建太学，设置学识渊博的老师，用来培养天下的士人，经常考试以便学生能全面表现自己的才能，就可以得到出类拔萃的人才了。现在的郡守和县令，是百姓的表率，其职责就在于上承朝廷政令而向下贯彻执行；所以，如果这些表率人物无德无才，就会造成君主仁德不为人所知，对百姓的恩泽无法贯彻的局面。现在的官吏都不能教化民众，有的还不遵守朝廷的法度，残酷地虐待百姓，与坏人勾结，贪求财利，百姓贫困孤弱，怨声载道，无法维持生计，严重违背陛下的要求；所以，阴阳不和，凶气充满天地之间，宇宙万物难以正常生长，天下百姓不得幸福，这都是官吏不称职造成的后果！

“官吏大部分是从郎中、中郎、二千石官员的子弟中挑选的，选任郎官又以家庭富于资财为条件，所选的人未必是贤能的人。而且，古代所说的‘功’是按照任官政绩的好坏来区分大小，并不是指任职的累积时间；所以，本事小的人，即使是任职时间很长，也只能仍做小官，贤能的栋梁之材，即使任职时间很短，也不妨碍他做辅政大臣，所以，官吏们都尽心竭力，一心做好本职工作而建功立业。现在就不是这样了。累积时日就可以猎取富贵，任期长久就可以升官晋职，

是以廉耻贸乱，贤不肖浑淆，未得其真。臣愚以为使诸列侯、郡守、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，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，且以观大臣之能。所贡贤者，有赏；所贡不肖者，有罚。夫如是，诸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，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。遍得天下之贤人，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、舜之名可及也。毋以日月为功，实试贤能为上，量材而授官，录德而定位，则廉耻殊路，贤不肖异处矣！

“臣闻众少成多，积小致巨，故圣人莫不以晦致明，以微致显。是以尧发于诸侯，舜兴于深山，非一日而显也，盖有渐以致之矣。言出于己，不可塞也；行发于身，不可掩也。言行，治之大者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。故尽小者大，慎微者著。积善在身，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；积恶在身，犹火销膏而人不见也。此唐、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、纣之可为悼惧者也。

“夫乐而不乱，复而不厌者，谓之道。道者，万世亡敝；敝者，道之失也。先王之道，必有偏而不起之处，故政有眚而不行，举其偏者以补其敝而已矣。三王之道，所祖不同，非其相反，将以救溢扶衰，所遭之变然也。故孔子曰：‘无为而治者其舜乎！’改正朔，易服色，以顺天命而已；其余尽循尧道，何更为哉！故王者有改制之名，亡变道之实。然夏尚忠，殷尚敬，周尚文者，所继之救当用此也。孔子曰：‘殷因于夏礼，

因此，廉洁与耻辱相互交错，贤能和与不肖相互混淆，不能判明真伪。我认为让列侯、郡守、二千石官秩的官员，各自从所管理的官吏、百姓中选择贤能的人，每年向朝廷选送二人，以为天子服务，而且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观察大臣的才能高低。谁选送的人有贤德，就给以赏赐，谁选送的人不好，就给以惩罚。如果这样，所有二千石官员都会全力以赴地寻求贤人，天下的人才都可以成为国家官员而为皇上效力了。把天下的贤人都吸收到朝廷中来，那么，三代圣王的功业不难于造就，而且尧舜的美名也可以企及。不要用任职时间长短计算功劳，而把实际考察出来的贤能之人列为上等，根据各人才能大小给以不同的官职，核查品行的高低而确定不同的官位，就会使廉洁和耻辱、贤与不肖区别得很清楚了！

“我听说积少成多，积小成大，所以古代的圣人，没有一个不是由默默无闻而变成美名远扬，由卑微而导致显赫；因此，尧起步于诸侯之位，舜兴起于深山之中，并不是一日之内突然显赫起来，应该说是日积月累循序渐进的结果。言语是由自己说出来的，不能阻塞；行为是由自身做出来的，无法掩饰；言语和行为，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内容，君子正凭借着它而感动天地。所以，能做好一切小事的人，才能成就大业，能注意一切细微之善的人，才能功德彰明。本身积累了善德，就像人的身体长高时那样，每天都在增长自己却不知道；本身积累了恶行，就像灯火熬干了灯油一样，自己也没有察觉；这正是唐尧虞舜成就美名和夏桀商纣成为后人引为鉴诫的原因。

“身处娱乐之中而不淫乱，反复行善而不厌倦，这就是‘道’。遵循道行事，可保证万世之后无弊害；只要有弊害产生，一定是因为没有按照道行事。一定是因为执行先王之道有所偏废，所以政治昏乱政令不行。补救的方法，就是运用王道中被偏废的部分去补救政治的积弊罢了。三代圣王的治国之道，侧重点各有不同，并不是它们相互矛盾，它们都是为了医治社会积弊，只是由于各自面对的社会情况不同，才形成了治国之道的不同。所以孔子说：‘要说无为而治的人，应该首推舜吧！’舜改换历法，改变朝服颜色，只是顺应改朝换代的的天意罢了。其余一切都遵循尧的治国之道，哪里改变过什么呢！所以，圣明的君主，有改变制度的名义，而没有改变治道的实际内容。然而，夏代推崇忠直，商代推崇恭敬，周代推崇礼仪，形成这种不同的原因，是因为它们要改变各自面对的现实，必须使用各自不同的治国方法。孔子说：‘商代继承了夏代的制度，

所损益可知也；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可知也；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。’此言百王之用，以此三者矣。夏因于虞，而独不言所损益者，其道一而所上同也。道之大原出于天，天不变，道亦不变，是以禹继舜，舜继尧，三圣相受而守一道，亡救敝之政也，故不言其所损益也。繇是观之，继治世者其道同，继乱世者其道变。

“今汉继大乱之后，若宜少损周之文致，用夏之忠者。夫古之天下，亦今之天下，共是天下，以古准今，壹何不相逮之远也！安所缪盩而陵夷若是？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，有所诡于天之理与？

“夫天亦有所分予：予之齿者去其角，傅其翼者两其足，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。古之所予禄者，不食于力，不动于末，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，与天同意者也。夫已受大，又取小，天不能足，而况人虐！此民之所以器器苦不足也。身宠而载高位，家温而食厚禄，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，民安能如之哉！民日削月朘，浸以大穷。富者奢侈羨溢，贫者穷急愁苦；民不乐生，安能避罪！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。天子大夫者，下民之所视效、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。近者视而放之，远者望而效之，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！

所进行的改革和发展是可以知道的；周代继承了商代的制度，所进行的改革和发展是可以知道的；以后继承周代的，就是过了一百代之后所实行的制度，也可以推测得出来。’这是说百代君主所用的治国之道，也就是使用夏商周这三种了。夏代是继承了有虞氏的制度，而孔子唯独没有说到两者之间的改革和发展，是因为两者的治国之道一致，而且所推崇的原则相同。道之所以精深博大，是因为它来源于天，只要天不变，道也就不会变；所以，夏禹继承虞舜，虞舜继承唐尧，三位圣王相互授受禅让天下，却遵循相同的治道，是因为其间不存在需要改革的弊政，所以孔子不说他们之间的改革和发展。由此看来，继承一个大治的朝代，继起者实行与原来相同的治国之道；继承一个政治昏乱的朝代，继起者一定要改变治国之道。

“现在汉朝是在大乱之后建国的，似乎应该略为改变周代制度的过分强调礼仪，而提倡夏代的忠直之道。古代的天，也就是现在的天下，同是这一个天下，为什么古代与现在相比，却会有那么大的差距！为什么败坏到如此程度？估计或许是因为没有遵循古代的治国之道吧，或许是因为违背了天理吧？

“天对万物也有一定的分配原则：让长出上齿的动物不让它再长犄角，让长出双翅的鸟类只让它有两只脚，这是让已受大利的，不能再取得小利。古代那些接受俸禄的官员，不许从事农耕收获，不得经营工商末业，这也是既得大利就不能再取小利，与天的分配原则是相同的。那些已得大利又要夺取小利的人，连天都不能满足其贪欲，更何况人呢！这正是普通百姓纷纷抗议生活没有保障的原因。那些达官显贵，身受朝廷宠荣而居高位，家庭富裕又享受朝廷俸禄，于是凭借着既富又贵的资本和权势，与平民百姓去争利，百姓怎能和他们抗衡啊！百姓逐日逐月地被削弱，最后陷入穷困。富裕的人奢侈成风挥金若土，穷困的人走投无路苦不聊生；百姓感觉不到活着有什么乐趣，怎么能避免犯罪呢！这正是刑罚繁多却不能制止犯罪的原因。天子的官员，是平民百姓观察仿效的对象，是远方各民族从四面八方中央观察仿效的对象；远近的人都观察和仿效他们，怎能身居贤人的高位却去做平民百姓所做的事呢！

夫皇皇求财利，常恐乏匮者，庶人之意也；皇皇求仁义，常恐不能化民者，大夫之意也。《易》曰：‘负且乘，致寇至。’乘车者，君子之位也；负担者，小人之事也。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，患祸必至也。若居君子之位，当君子之行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，无可为者矣。

“《春秋》大一统者，天地之常经，古今之通谊也。今师异道，人异论，百家殊方，指意不同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，法制数变，下不知所守。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、孔子之术者，皆绝其道，勿使并进，邪辟之说灭息，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，民知所从矣！”

天子善其对，以仲舒为江都相。会稽庄助亦以贤良对策，天子擢为中大夫。丞相卫绾奏：“所举贤良，或治申、韩、苏、张之言乱国政者，请皆罢。”奏可。董仲舒少治《春秋》，孝景时为博士，进退容止，非礼不行，学者皆师尊之。及为江都相，事易王。易王，帝兄，素骄，好勇。仲舒以礼匡正，王敬重焉。

2 春，二月，赦。

3 行三铢钱。

4 夏，六月，丞相卫绾免。丙寅，以魏其侯窦婴为丞相，武安侯田蚡为太尉。上雅向儒术，婴、蚡俱好儒，推毂代赵绾为御史大夫，兰陵王臧为郎中令。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，且荐其师申公。秋，天子使使束帛加璧、安车驷马以迎申公。既至，见天子。

急急忙忙地追求财利，经常害怕穷困，这是平民百姓的心理状态；急急忙忙地追求仁义，经常害怕不能用仁义去感化百姓，这是官员应有的意境。《易经》说：‘既背负着东西又用车拉着东西，招来了强盗抢劫。’乘坐车辆，这是君子的本分；身背肩担，这是小人应该做的事。《易经》的这句话，是说居于君子尊位而去做平民百姓的事，这样的人，一定会招来祸患。如果身居君子的高位，而做君子应该做的事情，那么，除了用当年公仪休在鲁国为相辅政的方法之外，就没有别的方法了。

“《春秋》推崇的天下一统，这是天地之间的根本原则，是古往今来的一致道义。现在，每个经师传授的道不同，每个人的论点各异，百家学说旨趣不同，因此，君主没有办法实现统一，法令制度多次变化，臣下不知应该遵守什么。我认为，所有不属于儒家‘六艺’范围之内，不符合孔子学说的一切学派思想，都禁止传播，不许它们与儒学并存发展，使邪恶偏激的学说归于灭绝，这样做了就能保证政令统一，法度明确，臣民就知道该遵循什么了！”

武帝很赞赏董仲舒的对答，任命他做江都国的相。会稽人庄助也以贤良的身份参加了考试，武帝选拔他担任中大夫。丞相卫绾向武帝上奏：“举荐来的贤良，有的研究申不害、韩非、苏秦、张仪的学说，用来扰乱国家政治的，请都予以遣返。”武帝批准了奏请。董仲舒从小研究《春秋》，孝景帝时做了博士官，平日的进退举止，不做任何不合乎礼法的事，学者们都用尊师的礼节尊敬他。等到董仲舒做了江都国的相，侍奉江都易王刘非。易王刘非，是武帝的哥哥，历来骄横，好逞血气之勇。董仲舒用礼义来约束他，易王也很敬重董仲舒。

2 春季，二月，汉武帝颁布赦令。

3 朝廷发行三铢钱。

4 夏季，六月，丞相卫绾被免职，丙寅（初七），武帝任命魏其侯窦婴做丞相，任命武安侯田蚡做太尉。武帝极重儒术，窦婴、田蚡都喜好儒术，极力推荐代地人赵绾担任御史大夫，推荐兰陵人王臧担任郎中令。赵绾奏请兴建明堂以接受诸侯王的朝见，并且向武帝推荐了他的老师申公。秋季，武帝派出使者带着表示礼聘的帛和玉璧，驾着安车驷马去迎接申公入朝。申公到了京城，拜见武帝。

天子问治乱之事，申公年八十馀，对曰：“为治者不至多言，顾力行何如耳！”是时，天子方好文词，见申公对，默然；然已招致，则以为太中大夫，舍鲁邸，议明堂、巡狩、改历、服色事。

5 是岁，内史宁成抵罪髡钳。

二年（壬寅，前139）

1 冬，十月，淮南王安来朝。上以安属为诸父而材高，甚尊重之，每宴见谈话，昏暮然后罢。

安雅善武安侯田蚡，其入朝，武安侯迎之霸上，与语曰：“上无太子，王亲高皇帝孙，行仁义，天下莫不闻。宫车一日晏驾，非王尚谁立者！”安大喜，厚遗蚡金钱财物。

2 太皇窦太后好黄老言，不悦儒术。赵绾请毋奏事东宫。窦太后大怒曰：“此欲复为新垣平邪！”阴求得赵绾、王臧奸利事，以让上；上因废明堂事，诸所兴为皆废。下绾、臧吏，皆自杀；丞相婴、太尉蚡免，申公亦以疾免归。

初，景帝以太子太傅石奋及四子皆二千石，乃集其门，号奋为“万石君”。万石君无文学，而恭谨无与伦。子孙为小吏，来归谒，万石君必朝服见之，不名。子孙有过失，不责让，为便坐，对案不食；然后诸子相责，因长老肉袒谢罪，改之，乃许。子孙胜冠者在侧，虽燕居必冠。其执丧，哀戚甚悼。子孙遵教，

武帝询问关于国家治乱的事，申公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，回答说：“治理天下的人，可贵之处不在于他多说些什么，只看努力实干得怎样罢了。”这时，武帝正喜爱文辞，看到申公的对答，沉默不语。武帝虽然对申公的对答不满意，但既然已把他招来了，就任命他做了太中大夫，安顿他住在鲁王在京城官邸中，商议有关兴建明堂、天子视察各地、改换历法和服色等事情。

5 这一年，内史宁成犯罪，被判处髡刑并且身带铁镣去服徒刑。

二年(壬寅，公元前139年)

1 冬季，十月，淮南王刘安来朝见皇帝。皇帝因为刘安从辈分说是叔父，而且有很高的才能，很尊重他，经常在无事时，召他来随意交谈，直到天很晚了才停止。

刘安一直与武安侯田蚡结交，他来京朝见时，武安侯到霸上迎接他，告诉他说：“皇帝没有太子，大王是高皇帝的亲孙子，广行仁义的美名，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。假若皇帝突然去世，除了大王之外还有谁能继承帝位呢！”刘安闻言大喜，赠送给田蚡丰厚的金钱财物。

2 太皇窦太后喜好黄老学说，不喜欢儒家学说。赵绾奏请，以后的国家政务不要再向太后奏报。窦太后勃然大怒说：“他想做第二个新垣平吧！”窦太后暗中搜集到赵绾、王臧贪赃的证据，以此责备皇上用人不当。皇上就废止了兴建明堂的事，赵绾等人主持的一切活动都被废止。赵绾、王臧被逮捕下狱，他们都自杀了。丞相窦婴、太尉田蚡被免职，申公也以有病为借口，被免职归家。

当初汉景帝因为太子太傅石奋及其四个儿子，都有二千石的官秩，就总计他一门父子五人的官秩之和，称石奋为“万石君”。万石君没有文才学问，但恭敬谨慎却没有人可以与他相比。子孙做小官，回来看望他，万石君必定身穿朝服以礼相见，不叫他们的名字。子孙有了过错，他不直接批评，而是离开正室坐到厢屋中，对着桌子不吃饭。然后，儿子们互相批评，有过失的人通过长辈人来求情，并且袒露身体前来请罪，表示一定要改正，石奋才答应他的要求而进餐。已经成年的子孙在身边，石奋即使闲居无事，也必定衣冠整齐。他主持丧事，表情极为悲痛。后代人遵循他的教导，